

论刘向《说苑》的历史意识

——兼论《说苑》在中国小说文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高月

(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市 408005)

摘要:由《说苑》上溯历史故事在先秦古籍中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一个由核心到边缘再到核心的发展过程。第一次转变是从“史”到“文学”的转变,第二次转变是从“文学”到“史”的回归。两次转变的质素不同,其中蕴涵了丰富的信息。刘向采用历史故事著书有多方面的原因,在《说苑》一书中,对历史材料的处理也有多种方式。尽管《说苑》的文体归属至今尚无定论,但它在中国小说文体形成之链上具有重要作用,是小说观念发展变化中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说苑》;历史故事;史传文学;历史意识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4-0174-05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历史文化遗产极其丰富,史传文学特别发达,中国人历来讲究“以史为证”、“以古鉴今”的证明方式。这种方式经过长期发展已积淀为一种浓厚的历史意识,成为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这种浓厚的历史意识观念对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表现之一即是在作品中大量采用历史故事。刘向的《说苑》是一部历史故事总集,本文即以《说苑》为典型,探讨这种文体演变的文化渊源及其对小说观念形成的作用。

一、历史故事:结构作品的要素

中国文学一开始就笼罩在浓厚的史学氛围里,学者在文章中采用历史故事的渊源要追溯到先秦诸子散文以历史故事说理的方式。《论语》中虽没有完整的历史故事,但已论述到了一些历史人物。如“羿善射,奭荡舟,俱不得死其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1]尧舜。“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2]泰伯《孟子》中提到的历史人物更加丰富,情节内容进一步具体化,有的已是相对完整的故事。如“太王迁岐”的故事,写了迁岐原因、过程与结果。《庄子》中的历史故事较之《孟子》更多,并出现了专门的故事集,如《庄子·让王》。不仅以史事作为渲染想象,而且发展到借古人之名编写故事,如《徐无鬼》中“吴王登狙之山”的

故事,实是借吴王之名表达自己对以语色骄人者极端鄙薄之情,虚构编造成分极为明显,以致今天的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庄子》(或《孟子》)中的这些故事就是中国最早的小说。《荀子》中历史故事的比重也比较大。到了《韩非子》和《吕氏春秋》中,历史故事的地位更加突出。《韩非子》中的《说林》、《储说》几乎全是历史故事的结集。在许多篇目中,历史故事已经可以和议论性文字相抗衡,有的甚至喧宾夺主,逸出了议论文范围,呈现出某种独立的态势。

由上可见,随着诸子散文的发展,先秦历史故事在其中呈现出一种独立化的趋势。最初只是作为议论的附属,后来发展为故事和议论相依附,最后发展到义理完全包含于故事的叙述之中,历史故事经历了一个从略到详的发展过程。这种独立化趋势发展到西汉刘向的手里,达到了一个高峰,出现了《新序》、《百家》、《列女传》、《说苑》等历史故事的总集。历史故事成为结构作品的要素。如果说作者在编撰《新序》、《列女传》和《说苑》的时候,还抱着某种政治目的,每一则故事都还包含着某种义理的话,《百家》则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纯粹的历史故事集,刘向在《说苑·序奏》中明确交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已经具备小说的娱乐功能。可惜《百家》现已亡佚。由于《说苑》创作的时间最晚,收录的故事最多,体系最完整,最能体现刘向结

* 收稿日期:2008-10-20

作者简介:高月(1974-),女,四川天全人,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集的思想,所以本文的论析以《说苑》为典型个案。

由《说苑》上溯历史故事在古籍中的演变,可知其经历了一个由核心到边缘再到核心的发展过程。这两次转变的质素不同,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信息。

第一次转变是从史实到文学之间的转变。发生在先秦历史典籍到诸子散文之间。《尚书》、《左传》、《国语》等先秦历史典籍文献,人们历来是以“史”的眼光看待的,对其记载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大多坚信不疑。正是由于一开始就笼罩在浓厚的史学氛围里,造就了中国人讲究“信实”的传统。使后人在阐释、宣扬某种理论时往往称引历史事实作为论证的依据。这种“信实”的传统经历了从实际行动的“尚实”到观念上“尚实”的过程。最初人们“尚实”,是相信实有其事,并对其坚信不疑。经过长期发展以后,这种意识已不自觉地渗透到人们的思维意识当中,使人们在判断一件事情时,往往以是否“真实”的标准来作判断。到了“轴心时代”^①,抱着“扬名”为目的的先秦诸子为了使本门学说在社会上成为显学,逐渐发现“以史为证”是阐释宣扬自家学说的一个有效的手段。因此在论说中开始引用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到后来,发现完全用真实的史事已不足以展示其理论的说服力时,逐渐对历史事件进行一些加工改造,最后干脆杜撰一些故事,依托于历史人物身上。于是“信实”便发展为观念上的“尚实”,即无论怎样荒诞不经,都要依托于历史人物。由于“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取”^[2],因此诸子以及后来的学者在引用历史故事的时候逐渐更注重其逻辑的真实性,而不追寻事实上的“真实”。历史故事逐渐游离了历史事实,文学的因素进一步加强。这是历史故事从核心到边缘的第一次转变所蕴含的信息。第一次转变可看作是历史事件向历史故事的转变。

当文中引用、杜撰的历史故事数量越来越多,从诸子散文到《说苑》,发生了第二次转变,历史故事独立成集。任何文体的出现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从萌芽到成熟总要经历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历史故事从诸子散文发展到《说苑》即其从边缘逐渐再到核心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历史故事这种文体逐渐成熟的过程。其发展轨迹是:历史人物→史事→历史故事(有一个数量发展过

程)→局部的历史故事结集→完全独立的历史故事集。起初,人们只是称引那些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及其历史事迹以加强行文的真实可靠性。后来发展为在称引史事的基础上,杜撰一些历史故事依附于历史人物身上。再后来在体味到采用历史故事的魅力之后,开始大量采用,并有组织地把同一类故事编排在一起。最后,发展到历史故事总集。这是一个从事实的真实向逻辑的真实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采用历史故事证明自己观点和理论的好处,引用越来越频繁,数量逐渐增多,客观上最终必然导致这种文体的完全独立。《说苑》的出现即是这样。刘向编撰此书,主观上旨在给统治者提供一剂疗救衰亡中的西汉王朝的良方,客观上却是形成了一部历史故事总集。在《说苑》中,除了《谈丛》和《杂说》,几乎全部是历史故事。如果说第一次转变是从“史”到“文学”的转变,那么此次转变可以看作是从“文学”到“史”的回归。不过前后两次转变的质素不一样,“史”的含义也不一样。前一个“史”是指正史,是所谓真实的史事;后一个“史”则是指稗史、野史等,其所载历史故事更注重逻辑上的真实性。

伴随历史故事所发生的两次转变,作为小说必构要素的虚构也随之产生。

刘向采用历史故事著述,客观上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积极意义。汉代,儒术独尊,某种著作一旦成为儒家的神圣经典,就会“以经术缘饰吏治”(司马迁语),带上某种政治目的,淡薄了文学的因素。“六经皆史”的观念,进一步抹杀了文学的色彩。刘向在其几部历史故事总集中,大量引用杂传野史,并自觉地编撰虚构了众多的历史事件,客观上有让文学摆脱“史”的观念的束缚、回归文学本位的意义。

二、刘向编撰历史故事的原因及方式

从刘向自身创作看,采用历史故事是其一贯作风,如《上封事书》、《上封事极谏》、《谏营起昌陵疏》等无不大量采用历史故事。当然,刘向采用历史故事著书,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和历史故事本身的特点有关。如前所述,历史故事具有“信实”、生动等特点,很容易被对方接受。这里的“信实”不是史料的完全真实,而是指故事逻辑的真实。在长期的史学氛围的影响下,中

^① “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是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在其《智慧之路》(柯锦华等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约在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人类精神的基础同时独立地奠定于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这个时代产生了我们至今仍其中思想的基本范畴,创造了人们至今仍赖以生活的世界宗教。”

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史为证”的传统接受心理。俗语“事实胜于雄辩”，正是这种心理最好的佐证。在“以史为证”的观念影响下，虽然人们有时也怀疑某事事实上的真实性，但只要符合逻辑的真实，对历史故事的某些事实的错乱如时间的错乱、人物的张冠李戴等，通常会忽略过去，以“事实”的心理接受之。如同一则史事，《说苑》著是某人，而《新序》则著为另一人。作为文献整理大家的刘向，对先秦古籍的熟悉程度是毋庸置疑的，他为什么会犯此种“错误”，至少他完全可以把两则故事的主人公统一起来，即使先秦历史故事在流传中有两种不同面貌，他也可以只取其一。种种情况表明，他编撰《说苑》时，在尊重历史典籍原貌的时候，也不完全相信史料真实性，他只在乎其逻辑上的真实能否为他所用。

其二是受到先秦两汉时期社会思潮的影响。先秦是一个“杂学”的时代。在那个文化高涨、思想解放的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学术奇葩竞相绽放。历史学家生于这样的社会世风中，形成一种“杂学”精神。史家的杂学精神在先秦两汉表现是很明显的。但史学家的杂学精神在写史书时会受到立场的限制，其杂学精神只有在史书之外的其他著述中尽情展现。因此强大的历史意识仍是先秦两汉时代的特征。受史官文化的影响，其他学术方面也表现出“以史为证”的倾向。

再次，和刘向“昧死以进谏”的心态有关。刘向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有深沉的政治忧患意识，有“吾而不言，孰当言者”的历史责任感。处于西汉由盛至衰的转折时期，一切不合理的现状，都进入他忧患的视野。而汉室宗亲的特殊身份，又使能否挽救衰亡颓废中的汉室王朝成为他忧患的核心。而他把解除忧患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皇帝身上。面对博览古籍的汉成帝，他企图以历史上各国兴亡盛衰的教训，圣君贤臣之言，忠臣死士之行，唤醒迷茫中的皇帝，给他一剂救世良方。因此才收罗编撰了这一部“义理可观”的《说苑》。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历来学者所忽略的一点，即刘向采用此体与“作者预期中的读者”心理有关。

梁启超说过：“凡作一书，必先问吾书将以供何人之读，然后其书乃如隰之有畔，不致泛滥失规，且能针对读者以发生相当之效果。”^[3]读者不同，书之精神及其内容组织亦有所不同。刘向编撰《说苑》的目的在于向汉成帝进谏，书的读者是一代君王汉成帝。而他希望成帝读了此书能够“以助观览，补遗阙”。古人是通过选择历史故事达到

对现实的沟通，但究竟如何选择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作主体的心境、志向、兴趣以及对相关历史事实的掌握程度，还和创作主体的生存环境，亦即和时局形势密切相关。刘向对历史故事的熟悉程度是毋庸置疑的，生于一个盛衰转折时期，他所选择的历史材料都和现实有着密切联系，这样更容易实现古今对接，以古鉴今，借古讽今。刘向意在挽救时道衰亡的主旨，决定了他对历史材料的取舍。为了达到著书的目的，刘向在采集史料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照搬，而根据自己的观点对不符合要求的材料作了删削（如另编为《百家》）和加工改造。

刘向对历史材料的处理大致有三种情况：最常见的是直接辑录先秦典籍；第二种，所辑录的材料和先秦典籍有个别字句或语句不同，这可能是流传过程中所导致的外误；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种情况，即所选史料经过刘向比较明显的加工改造。其改造方式主要有：

一、在原有的故事后面加上一个小尾巴，表明作者看法，强调“义理”的“信实”性。如《贵德》“武王克殷”条，“凡所以”以下是刘向所加。这则故事原本完整，删去此句，也能表现“贵德”主旨。加上一个尾巴，无非强调“仁德”的重要性。再如《尊贤》篇“哀公问于孔子条”，此则故事《荀子·哀公篇》、《韩诗外传》四和《家语·五仪篇》皆有记载，但“是故先其仁信之诚者”以下，三书均无，明显为刘向所加。加上此段话客观上造成的效果即是比原故事更能突出“尊贤”的中心。

二、把人物张冠李戴，或把多个人物的故事剪辑成一个故事，并不在乎事件的真实性，注重“逻辑的真实”性，加强故事的生动性和义理的说理力。如《敬慎》篇“高尚尊贵”条：此章前半见《荀子·非十二子篇》、《韩诗外传》六，又略见《邓析子·转辞》篇。自“故土虽聪明圣智”以下，则见《荀子·宥坐篇》、《家语·三怨篇》。在《说苑》中，刘向对史料进行了剪辑和重新组接。再如，《尊贤》篇“禹以夏王”条也是多条史料的杂糅。

三、对史料的详略进行重新处理，以求突出中心。如《政理》“鲁有父子讼者”条：鲁有父子讼者，康子曰：“杀之。”孔子曰：“未可杀也。夫民不知子父讼之不善者久矣，是则上过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为本，今杀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教而诛之，是虐杀不辜也……”此事《荀子·宥坐篇》、《家语·始诛篇》、《长短经·政体篇》皆有记载，文多不同。《韩诗外传》三与此略同，而文较详。再如《杂言》“曾子从孔

子于齐”条，《晏子·内篇杂上》、《荀子·大略篇》、《家语·六本篇》都载有此事，但《说苑》此文未袭用任何一家，比其他各本都简略。又如《至公》篇“楚庄王之时”条，此事《韩子·外储说右上》有记载。两相比较，《韩子》文较详细，对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皆有清楚的介绍，对故事结果也有说明。而《说苑》则较简略，省了“太子入茆门”的原因及“车不得入茆门”的楚法及楚庄王对此事的最终处理，只是截取一个片断，借楚庄王之口突出了“庆”不营私的“至公”品格。

四、对史料作局部改动。因为故事侧重点不同，表现出的旨意也不同。此种改动是为加强故事的“义理”。在《说苑》中，这种处理方式比较常见。如：《尊贤》“魏文侯从中山奔命安邑”条，此事又见《韩诗外传》九、《史记·魏世家》、《春秋后语》，但都不载魏文侯语，《说苑》所载独详。又如《说苑·辩物》：“逮秦皇帝即位，彗星四见，蝗虫蔽天，冬雷夏冻，石陨东郡。大人出临洮，妖孽并见。荧惑守心，星弗太角，太角以亡，终不能改。”所载灾异现象亦见于《秦始皇本纪》，但刘向明言各种灾异是上天向秦始皇提出的警告，这是司马迁没有公开表露的。而且，“大人出临洮”事象，《秦始皇本纪》中并未提及，应是刘向根据各种传说所作的附加，进一步强化了国亡必有灾异的叙事模式。

五、根据传说，以先秦故事题材自己创作历史故事。如《善说》“赵襄子谓仲尼”条：赵襄子谓仲尼曰：“先生委质以见人主，七十君矣，而无所不通识，世无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对。异日，襄子见子路，曰：“尝问先生以道，先生不对。知而不对，则隐也，隐则安得为仁？若信不知，安得为圣？”子路曰：“建天下之鸣钟而撞之以槌，岂能发其声乎哉？君问先生，无乃犹以槌撞乎？”赵襄子与孔子两人生活的时代不相及，不可能相互问答，此则可能是刘向自己编造的。再如《善说》“蘧伯玉使至楚”条，此事不见各家记载，但与《左传·襄二十六年》所记声子伍举事相类，大约也是刘向据传说改造的。又如《权谋》“赵简子使成何、涉他”条，此事《左传·宣八年》和《宣十年》皆有简单记载，两相比较，刘向除了采用事件的起因、结果外，把整个过程全部改变了，目的当然是为了证明他自己的论点。又如，《说苑·辩物》在追述秦二世的恶行时写道：“二世立，又重其恶。及即位，日月薄蚀，山林沦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经天而行。无云而雷，枉矢夜光，荧惑袭月，孽火烧宫，野禽戏庭，都门内崩。”所言灾异，是《史记》中不曾提到的。实际上秦二世当政才三年时间，也不可能出现如此众多的灾异。

显然是刘向根据秦二世时期的荒淫暴政，综合各种传说，把数量众多的灾异集中在短时间内，从同类相应观念出发，通过大胆推理与想象，编撰故事，强化灾异频繁则国亡的论旨。

对史料的诸多改造，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中心论点，同时也是为了达到向汉成帝进谏的目的。

刘向编撰《说苑》既有明确的读者对象，他对读者必然有一种“预期的期待”。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是为读者而存在的；作品的目的在于供给读者欣赏，认知，使读者澡学精神，或获取某种信息”^[4]。因为读者看一本书，总是有所期待的，因而作品是否成功，往往取决于作者如何处置读者的期待。换句话说，作者要艺术地向读者传达信息，就必须艺术地使他产生某种期待和反应，并对这种期待和反应加以艺术地引导。这就是刘向为什么要对历史故事进行诸多改造的原因之一。从这一点来说，刘向的改造是成功的。

在先秦两汉时代，受“史官文化”的影响，强烈的历史意识成为文人学者精神的一部分，表现在文学之中即是熔史入文，引古鉴今，强调“以史为证”、“知今宜鉴古”，也即刘勰所谓“明理引乎成辞，徵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5]。表现在内容题材上，大量采用历史故事。且无论故事怎样荒诞不经，都要依托历史人物，崇尚逻辑的真实性。为了力求真实，在语言形式上常采用对话形式。并且大量引用《诗》、《书》、《论语》等先秦的经典著述。

三、《说苑》在中国小说文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尽管《说苑》的文体归属至今仍无定论，然而不能否认它在中国小说文体形成之链上具有重要作用，是小说观念发展变化中的重要一环。

“不管故事在当代小说里是否仍将一如既往地受到宠爱，以及在小说的未来发展中，故事是否将最终被冷落和漠视，小说作为文学家族中的年轻成员，在其以往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一直与故事相伴，这乃是无可置疑的事实。”^[6]作为第一部历史故事总集的《说苑》，在小说观念形成之链上产生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

任何一种文体从产生到定型必定会经历较长的发展过程，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必然会出现几个重要的环节，发生几次质的飞跃。“小说”一词从产生到具有现代文体意义的小说概念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尽管古代“小说”和作为现代文体意义的小说含义不同，但不可否认桓谭、班固等人的

小说观念是现代小说观念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从《庄子》出现“小说”一词，到桓谭、班固等人，其间小说观念已发生了重大的质的飞跃。而刘向的《说苑》等故事集刚好处于两者之间，在小说观念的发展变化中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唐前小说虽然还不是真正的小说，但小说的许多文体因素已经在其中开始萌芽了。”^[7]《说苑》在小说观念形成之链上的作用首先体现为虚构意识明显增强。虚构是小说之为小说的最根本特性。“没有虚构，就没有真正意义的小说。”^[8]《说苑》是在强大的史学氛围笼罩下产生的，然而刘向并非完全遵循正史“实录”的原则，而是根据实际编撰需要作了某些变通。例如在取材上，并非完全取材于正史，而更多地是取材于诸子及野史杂传等。正统史书虽也收录一些有关历史人物的生活琐事，甚至民间传说、灾异祲祥、神话故事等，但往往是“事关军国，理涉兴亡”才“有而书之”^[9]书事篇。野史杂传作者则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有关历史人物轶闻轶事、委巷之说等，题材本身即带有很强的虚构性。所以当刘知几以史家的眼光来审视《说苑》时，认为其“广陈虚事，多构伪辞”^[9]杂说。其次，刘向在对历史材料的处理上体现了更大的自主性与随意性。“向所类事，与《左传》及诸子，间或时代抵牾，或一事而两说三说并存，《韩非子》亦如是。”^[10]且都按主题的需要作了相应改动。如赵氏孤儿的故事在《说苑》和《新序》中皆有记载，但《说苑·复恩》以韩厥报赵盾之恩为记叙中心，《新序·节士》则以公孙杵臼和程婴保护赵氏孤儿的行为为中心，两书侧重点不同。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虽与采录来源不一有关，但作为精通先秦典籍的刘向对此并不进行参校统一，说明他并不在意历史材料的真实性，反而有意识地进行了一些虚构，这就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文体意味。据刘向本人《说苑叙录》“除去与《新序》重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

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表明其中一部分就是刘向本人虚构创作的。第二，在庄子看来，小说是与“大达”相对立的小道学说，无多大意义。桓谭则认为小说“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班固也认为其“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肯定了小说的某种社会功能。刘向在《说苑序奏》里明确说明《说苑》是中义理的可观之书。其内涵虽与桓谭“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和班固“必有可观”并非完全统一，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相通的。可以说，刘向直接引发了桓谭和班固对小说的认识。第三，从目录学上追寻，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论小说之后，还著录了小说十五家于后，刘向《百家》也在其列。班固的《汉志》是对刘歆《七略》删其要而成的，而刘歆《七略》又是秉承其父刘向的《别录》而来的。源流关系清晰可辨。而且从《说苑序奏》中可看出《说苑》、《新序》除“中义理”外与《百家》体例是完全雷同的，因此其与班固的小说观念实际上是暗合的。种种迹象表明，刘向的《说苑》等书在庄子与桓谭、班固的小说观念之间起了重要的环节作用，因此在中国小说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 [1] 论语[M].
- [2] 亚里士多德·诗学[M]//伍蠡甫，蒋孔阳·西方文论选(上册).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 [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3.
- [4] 常森·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06.
- [5] 文心雕龙·事类[M].
- [6] 徐岱·小说形态学[M].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18.
- [7] 韩云波·刘知几《史通》与小说观念的系统化——兼论唐传奇文体发生过程中小说与历史的关系[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94-100.
- [8] 马振方·小说艺术论稿[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8.
- [9] 刘知几·史通[M].
- [10] 严可均·铁桥漫稿[M]. 清光绪心矩斋重刊本.

责任编辑 张颖超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f Liu Xiang

——The Role of Shuoyuan in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Novel Style

GAO Yu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8005, China)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the historical stories in the Pre-Qin books dated in Shuoyuan (The Garden of Saying) evolved roughly from the core level to the peripheral position and back to the core position again. The first shift is the one from history to literature. The second shift is the return of literature to history. The two shifts differ in quality and elements. Many factors accounted for Liangxiang's use of historical stories. There also many different ways of has a different ways to deal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Shuoyuan. Although it is not agreed as for the style of Shuoyuan,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tyle formation in Chinese novels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volution of fiction concepts.

Key words: Shuoyuan (The Garden of Sayings); history story; literature on the history story;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